

彭真在 1957 年整風、 「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

鍾延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1957 年春，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其原先規劃對黨內進行整頓與革新，但是到後來卻加入了「反右派」的議程，使得運動演變成對黨內外敢言人士的大肆討伐和追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的彭真，在其中的政治角色和影響問題，西方學者雖早已注意，但研究過淺並認識有誤；中國大陸官方史家則對之不敢細談和深究。本文以近年蒐集的各類文獻資料為基礎，經過考察後指出：彭真雖非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但他深受層峰信賴而參與運動各階段的政策制定。彭真因身任中央書記處第二號書記，直接肩挑運動相關政策如「引蛇出洞」的執行，他對自身分工負責的領域如統戰和政法部門的「反右」操作上，更是獨當一面。與此同時，彭真又因擔任首都北京市的最高黨政負責人，直接掌控當地的運動發展。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市的運動作法和經驗，常成為其他省市參照模仿的對象。彭真對運動所作的兩層次（中央和北京市）、多面向的參與，使之成為運動的實際操辦者和運動激化發展的重要關係人。在運動中的高層菁英互動方面，除了可見彭真對毛澤東的悉心跟隨和力爭表現，也可觀察彭真和鄧小平為貫徹運動決策的緊密合作。最後，透過彭真的此一個案研究，還可有助於進一步地認識和了解中共的政治運動，特別是藉之檢視在運動過程中承上啓下、職司執行的「督導人」的相關角色。

關鍵字：彭真、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毛澤東、中共黨史

* 作者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永發教授、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李海文研究員的指導和支持。作者也感謝三位審查人對本文所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001-MY2）。

收稿日期：102 年 5 月 29 日；接受刊登日期：103 年 3 月 7 日

壹、前言

2011年2月19日，北京大學舉行校友春節聯誼會，出席的校友高達300至500名。此會是北大每年一度連絡校友的例行活動。然而，一連幾年，這一聯誼會都出現了十餘名的陳情者，讓校領導退避三舍、藉故不來。他們是何許人也？原來是一群在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北大學子。到了2011年，他們雖已是70、80歲的老先生、老太太，但卻仍要求北大為他們當年在政治上被打成「右派」冤案，予以正式道歉和賠償。這群已是白髮蒼蒼的當年「右派」北大生，當說到造成他們黃金青春提早夭折並承受多年磨難的元凶禍首時，自然提到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的發起者毛澤東。但是他們談到次數最多的高官、憶及時流露最多憤恨之情的高幹，則是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的彭真（俞梅蓀，2011）。從這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彭真在該運動中的活躍程度和負面影響。

關於彭真對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參與和意向的問題，很早就引起西方學界的注意。只可惜，其研究情形甚為不足，認識上也存有偏差。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基於「兩條路線鬥爭」（two-line struggle）的思維，認為彭真屬於劉少奇的系統，長年協助劉負責中共的組織與幹部工作。由於1957年的整風旨在檢討、改造幹部的不良作風問題，如同是對劉、彭過去業務的檢查與批評，因此彭對整風的發起有所遲疑和抗拒；在運動開始抓「右派」後，他才表現得積極（MacFarquhar, 1974: 192, 194-197, 203, 205-207, 270, 282, 288）。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則持相反的意見。他認為：彭真支持整風，對抓「右派」則不若馬若德所言般的嚴厲（Teiwes, 1993: 197-198, 223）。¹ 然而，如果對馬氏、泰氏的相關論述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

1 皮特曼·波特（Pitman B. Potter）所撰的海外唯一一本以彭真為題的專著，主在介紹彭真對中共政法工作的主張與影響，對於彭真對整風、「反右派」的態度問題，波特僅列舉包括馬若德、泰偉斯在內的各方說法，自己不敢貿然作出判斷（Potter, 2003: 73-79）。

現兩位學者皆僅憑彭真的三言兩語，即作為論斷的依據。他們除了立論基礎薄弱並且根本無法讓讀者知曉彭真在運動中的具體角色和作為；就他們所特別關心的中共菁英議題而言，彭真在運動期間如何和其他黨內要人，特別是毛澤東以及彭在中央書記處的上級鄧小平互動？他們也鮮有著墨，留下一塊重要的研究空白。

針對彭真如何涉入整風、「反右派」的問題，中共官方出版的《彭真傳》強調：彭真無論在整風發起前後或是「反右派」開始以後，都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然而，若進一步地對之細讀，可以注意到該傳對於彭真參與「反右派」的描寫，竟沒有提及任何一個經彭之手而陷入「右派」深淵的具體個案。這本彭真的官方傳記倒是特別強調彭真主張將北大教授傅鷹立為「中右」標桿一事，亦即只要言論不超過傅氏的人，就可以不被劃為「右派」，試圖以此事凸顯彭真欲限制運動打擊面的努力（《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a: 928-954）。《彭真傳》的此一「巧心」，卻繞不過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彭真立傅鷹為「中右」的標桿後，何以仍有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彭真與這個所謂的運動「擴大化」又有何干係？綜上所言，《彭真傳》對其傳主參與「反右」的處理態度與手法，可概括為：「表面上正視問題，實際上擱置問題」。

綜前所述，針對彭真參與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問題，迄今尚無一個嚴謹的專門學術研究。西方學者只有甚為簡單的觀察，即便如此，也存在錯誤，未能對之作深入的探討；² 中國大陸官方史家則依照「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對其點到為止而已，不敢深究。彭真在 1957 年春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的前後，其政治態度為何？有何作為？運動加入「反右派」意圖後，彭真如何對之進行部署？在「反右派」開始後，他怎樣投入相關的政治鬥爭？在後來運動衝擊面的氾濫擴大上，彭真介入的情形為何？在運動期間，彭真和毛澤東、鄧小平之間的互動情況和影響為何？另外，本文對彭真所作的細節的實

2 例如：馬若德和泰偉斯都僅簡單地利用彭真的講話片段，即對彭真在整風運動的立場和態度輕率地作出判斷，而且他們各自的觀察都與實際狀況有所出入。馬氏認為彭真在整風醞釀和開始初期暗中進行抵制，泰氏主張彭真在「反右」時不是很積極。實際上，彭真在運動的各個階段皆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立場為準，積極行事、唯恐落於人後。至於彭真如何具體執行運動政策、對運動的發展造成什麼影響，他們更都沒有論及。

證研究 (detailed empirical research)，又將如何增進我們對更大的中共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毛澤東主政期間的一大政治特色—政治運動的認識？本文嘗試回答上述的問題。

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彭真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外最重要的領導人，既參與運動各階段的政策制定，也因身任中央書記處的重要成員而負責相關政策的執行，在其黨內分工領域如統戰和政法內的運動操作上，更是獨當一面。與此同時，彭真又因擔任北京市的最高黨政負責人，直接掌控當地的運動發展。事實上，彭領導下的首都運動發展，一方面是中央運動決策的首要推行地；另一方面，其之發展又回過來證成中央對運動的設想，並成為其他省市的參照模仿對象，甚至影響中央對運動的觀感判斷和下一階段的安排。彭真對運動的兩層次（中央和北京市）、多面向的參與，使之成為運動中的重要鋒將。彭真在運動中與毛澤東、鄧小平密切配合，強力、有效地推進運動，讓後者甚感滿意，並促成相關人士在之後作更進一步的政治協作。另外，以彭真的案例為基礎，可以嘗試梳理出在中共政治運動推行過程中與之相似的政治角色—負責貫徹和執行運動的「督導人」的基本職責和傾向。

本文之目的是：試圖重建彭真在中共這場惡名昭彰的政治運動中的角色和活動，冀以對彭真個人的歷史、其對首都的政治治理，以及對毛澤東時期的菁英互動和政治運動的研究有所裨益。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主要有如後六個部分：一、在整風醞釀和展開期間，彭真所持的態度與活動情形；二、對「整風」中間加入的「引蛇出洞」方針，彭真分別在中央層級和北京市落實的情況；三、彭真在「反右」開始後，如何揪鬥、深挖上至廟堂、下至校園的大小「右派」；四、中央宣稱「反右派」鬥爭基本取得勝利後，彭真在哪些部門仍繼續不休地進行政治獵巫；五、彭真對「右派」劃線和審定上的舉措；六、簡要探討彭真在運動中和毛澤東、鄧小平的互動情形。最後在結論的部分，試以彭真此一個案研究，扼要地探討在中共的政治運動中，擔負執行任務的「督導人」的政治角色和影響。

貳、彭真對發起整風的態度

一、響應毛澤東的整風構想

1957 年春，毛澤東鑒於中共在去年宣稱完成資本主義的基本改造、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後，城市中出現層出不窮的罷工、罷課事件，農村地區也湧現農民退出合作社的風潮，開始思考如何妥善處理社會中的各項矛盾和問題。毛澤東認為作為執政黨的中共，首先必須反求諸己，特別是要革除自身存在的錯誤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包括：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等。在黨幹和黨員嚴以律己後，方能澄清吏治、知民所欲，進而調動民眾的積極性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具體辦法就是沿用中共延安時期整風運動的做法：一方面發動群眾對黨展開無保留的批評，另一方面，黨的各級成員也必須不護短地作自我批評。毛澤東在 2 月 27 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演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 3 月 12 日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系統闡述了上述的政治理念，冀望為整風的預備發起進行動員（毛澤東，1999a: 204-244; 1999b: 267-283）。

1956 年中共舉行「八大」，成立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政治機構內，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為主、彭真為副；組織更明確規定：彭真協助鄧小平「負總責」。毛澤東在 1957 年春開始醞釀發起整風後，中央書記處就開始為之忙碌起來。3 月中、下旬和 4 月上旬，鄧小平勤走華北各省，推銷整風的政策和精神。在鄧小平離京期間，彭真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進行之際，陪同毛澤東和文學、藝術、高級教育工作者進行座談並參與討論，並在會後傳達毛要求各級黨幹須確實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務必打破黨內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作風的指示。彭真還挑起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工作，討論、制定能體現毛整風倡議的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也指示中央相關部門對整風的發起預作準備和展開動作（《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197-200, 203-204）。

在中央分工兼管統戰工作的彭真，就指示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進行政治鬆綁，以為黨內、黨外合作提供條件：在政治上、思想上，中共繼續維持

對民主黨派的領導，但對後者「今後組織上不加干涉」，「〔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鈞想辦《光明日報》，我們決定放，有錯誤可以批評」。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也飭令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總工會等部會：「先準備意見，如對高級幹部的整風意見怎麼辦？知識分子和軍隊中怎麼搞法？」另外也指示要向上海等省市徵求對整風的意見（《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05, 208）。對於地方傳達學習毛澤東整風講話的情況，彭真也予以關注。針對不積極認真者如陝西省西安市委，他就同意對之公開加以揭露並說「批評得好」（鄭笑楓，2007；皮學軍，2012: 51）。

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正式宣告在全黨進行一次整風運動。彭真參與討論和審閱此一文件。為了更積極地爭取黨外人士協助中共進行開門整風，由彭真分管、李維漢領頭的統戰部，從5月8日起開始召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工商界人士參加座談會。李維漢將座談會所整理的報告上報黨中央時，多會經彭真核轉（沈志華，2008: 538, 562）。對毛澤東提倡的整風，彭真自己內心的真實所想是難以探知的。但就他當時在中央的政治行徑和外顯表現，其應可算得上是對毛發起整風政策的一個有力的支持者和唱和者，亦步亦趨地緊跟著以毛為首的黨中央。

二、領導北京市的整風

在北京市的整風方面，對於毛澤東籌備發起的指向黨內弊病的整風運動構想，彭真都即時向他領導下的北京市委高幹傳達。3月16日，彭真就對市委宣傳部和高等學校黨委負責人表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對待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黨幹不能一有人批評就說對方是居心不良。在同一場合，彭真更要求其治下的北京市要成為這場整風的標竿與模範：「6、7、8月要開始整風，北京市要做典型。」（《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01-202）

彭真知曉毛澤東對於其整風構想在黨內遇到各種阻礙與抵制甚為不悅。彭真因此積極地催促其治下的北京市推行整風。彭真除了批評北京市的幹部「嗅覺有點遲鈍」、「認識還不系統」，更進一步要求市委領導先自己「搞通思想」，接著在局處長、區委以上、大廠黨委以上幹部中檢查思想。彭強調：「不

要怕鳴，不要怕放，不怕罷工、罷課，先鋒隊自己先站穩，然後到群眾中去。」5月4日，彭真也機敏、迅速地將截至當時為止北京市傳達學習毛《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呈送報告。藉此一方面讓以毛為首的中央知道京畿地區黨員與群眾對整風的態度和反應；另一方面，讓毛知道彭真自己在推行整風上沒有輕忽、怠慢。彭真在推行整風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積極、勤快，在5月7日得到以毛為首的黨中央的好評，認為「報告很好」，指示轉發各地參考，並可登載黨刊（《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16-218）。

彭真在對北京市委高、中級幹部做完初步思想動員後，5月8日，他召集市委高幹討論如何在市內落實、推行整風運動。步驟上，彭真指示要：一、學習指導整風的文件，並強調要認真領會文件的精神實質。二、由市的黨政高幹帶頭做榜樣，嚴肅而認真地檢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狀況。在取得經驗後，逐級往下推進。組織上，在彭真同意下，北京市委同日發出《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計畫》，成立由劉仁擔任組長的整風領導小組，以領導和指揮市內的運動（《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19-220）。

北京市委整風領導小組由劉仁掛帥，是否代表了彭真對市裏後續的運動發展不聞不問？實則不然。根據市委整風領導小組成員范瑾後來的證詞：「1950年代中期以後，平時彭真一般不參加市委的會，真重要的會議才參加。各次運動彭真抓得很緊，親自主持並聽彙報。」（李海文、王燕玲編，2002: 291）范氏所言的彭真「抓得很緊」的「各次運動」，自然包括1957年由毛澤東一手發起的整風運動。

從後來整風運動的各階段看來，彭真雖不是市委整風領導小組的一員，他仍可藉由召開市委的各種大小會議，對北京市的運動進行指揮和指導。由於彭真管事認真細膩、不拘大小的風格，更重要的是，其深曉北京市的整風在中央整個運動佈局中的先行地位和展示意義。因此，彭真既會對北京市的運動做出方向性、綱領式的指示，有時也會對組織上直接歸市委領導的單位如重點高校的運動走向，以至具體個人，特別是所謂的名人賢達的運動境遇，直接過問和裁決。劉仁為首的整風領導小組的角色，則主要是按彭真發佈的運動指示辦事或將之落實在京畿地區，並負責處理首都運動中發生的具體事宜，以讓彭真將更多的心思與精力放在參與中央對全國運動的管理上。由於

劉仁和彭真有多年共事的經驗和默契，劉和市委主要成員在運動的執行過程中，如有重要的事態動向和戰果捷報，也會注意向彭真報告與請示。彭真聞知後即能在黨中央議事時交付討論或呈報受獎。

參、彭真對「引蛇出洞」的積極參與

一、協助中央施行「引蛇出洞」策略

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整風開始後，針對中共的施政，竟出現為數眾多的嚴厲批評。毛因而在1957年5月中旬，改在運動中加入「引蛇出洞」的內容，以辨識「右派」及其藏身之處。³對於運動從真心整風到狠心「反右」的這種政治轉變，彭真除了組織紀律上、思想認識上必須跟從毛澤東領銜的中共中央，他自己在很大的程度上，或也深有同感、認為有所必要。亦即在彭真個人的主觀意識上，是同意此一「右派」敵情嚴重、需要重手處理的政治判斷。

在中共開門整風後，各方逐漸湧現多種針對中共施政的尖銳批評意見，彭真個人也感受到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因為一些引起黨外、以至黨內下層非議的政策，彭真個人多深入參與、直接扮演要角。例如在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群眾運動，連彭真近身的工作人員都坦承：「1955年開展的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及其後的『肅反』運動搞了『面對面』的揭發鬥爭，傷害了許多同志，遺留了很多問題。」（王漢斌口述、韓勤英整理，2012: 69）換言之，整風中出現的不少指向中共的嚴厲批評，實際上可連繫到彭真個人，若相關問題再被進一步地追究，彭真恐怕得要負起有關的政治責任。所以當整風變調成懷有蓄意整人的陰謀後，彭真應是欣然接受並積極具體張羅。

3 關於毛澤東因為受到批評意見的影響，而在原本的整風運動中另外加入「引蛇出洞」、「反右派」議程的說法，持相關意見的研究者，例如：朱正（2001: 110-120; 2011: 87-89）、陳永發（2001: 683-686），以及沈志華（2008: 461-462）。本文也採取此一說法。但誠如審查人所指出：另有一種看法是強調毛澤東打從一開始即持以「引蛇出洞」的圖謀，亦即其發動整風就是為了「反右派」。如此主張以李慎之（1998: 114-115, 124-125）為代表。在此註明，以資比較和區別。

如何「引蛇出洞」？毛澤東所想的辦法是：中共繼續表面維持虛心檢討的姿態，使盡全力敦請各方指教與指正；再將這些中共邀請而來的批評與建言，特別是讓中共感到懷有敵意、別有所圖的言論，登諸報紙。這樣一來，持相關意見者就無所遁形，黨幹與群眾就可以好好「欣賞」他們的政治醜態。5月21日，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彭真偕同鄧小平命令中宣部、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分類整理整風「鳴放」中被引出的「錯誤」主張和觀點，同時佈置撰寫反駁的社論與文章。彭真在此會上對黨的主要「喉舌」的負責人表示：「黨報要有思想性，只要思想上堅定，就可以把資產階級打下去。資產階級抓國防、公安、財經不行，比較容易的是思想戰線，這是今後和資產階級的最大鬥爭。」「幾個黨報要合作，要有分工，互助合作，發揮自己的長處。」（《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27）

在此前後，彭真更直接出面「引蛇」和「釣魚」。彭真和李維漢利用整風初期開始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敦請在朝為官或活動活躍的民主黨派要員到會發表高見，請其步入「右派」之甕。根據後來被中共打作「大右派」的章伯鈞的妻子回憶，彭真就殷勤約請章伯鈞數次，邀之向中共提意見（黃河清，2004）。

5月27日夜，毛澤東召集各省市黨委書記舉行關於整風「鳴放」問題的彙報會。在這場內部會議中，彭真以中央領導人的身分，向來自各地的方面大員說明近日來發生在京畿地區的重要「右派」陰謀活動：

整風運動開始是整頓黨的隊伍，現在發現有階級鬥爭問題，有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向我們進攻，有的集中力量攻肅反，攻公安工作，有的要在政協組織知識分子委員會；黨內也有一些政治上動搖的「起義分子」，在這種情況下，要通過大放，才能識別各種人物的政治面目，牛鬼蛇神才能看清楚。放的好處是右派暴露，中間派出氣（《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0）。

彭真的話中雖沒有明指誰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但是其所指為何，呼之欲出。攻擊中共「肅反」最力者，首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

黃紹竑。章伯鈞雖主要是因為提出「政治設計院」而觸怒當道，但在 1957 年初，他與彭真一同出訪時，也曾就「肅反」個別的案子向彭反映不同意見。整風期間，章也提出中共應要下決心檢討「三反」、「鎮反」及「肅反」。主張在政協成立知識分子委員會的人，就是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相關人物當時都已被中共中央認定為「大右派」。這些以言獲罪的黨外人士，他們之所以發表惹禍上身的言論，細究起來，不正是彭真、李維漢利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引出來的嗎？

可能正因為彭真、李維漢組織的座談會「引蛇出洞」成效卓著，6 月 3 日，彭真參與的中央書記處要求中央相關黨政部門「應繼續放，召開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2-233）。

二、領導北京市的「引蛇出洞」

彭真在中央協助佈置「引蛇出洞」策略之餘，他也對北京市主要高校佈置此一詭計。5 月底，彭真在市委所在地，親自召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的黨負責人與會。根據出席相關聚會的人士回憶：彭真在會上督促這幾所大學的負責幹部，要貫徹執行中央新定的運動方針。彭真在會中批評北大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和清大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蔣南翔「怕放」。彭表示：「現在就怕他們不放，要請他們出來，讓他們放夠，不要急於反駁。同時要組織左派隊伍，準備將來反擊。」（阮銘，2010: 182-183）針對同一會議，另外也有資料指稱，彭真囑咐這些重點高校黨幹：用各種辦法，製造氣氛，引蛇出洞。彭真指示他們示弱，使「右派」們盡情鳴放，無所顧忌。彭還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丁抒，2006: 107）

直至中共中央正式發起「反右派」以前，彭真繼續以聽取高等學校黨幹報告的方式，過問、指揮校園的運動發展。6 月 1 日，彭真聽取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和北京石油學院等校負責人彙報校內「鳴放」的情況。同日的另一個場合，彭真對大學高校的運動情勢表示：「現在大學裡已經是狂風暴雨。但黨並不害怕，狂風暴雨是颳不倒我們的。」（《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2）。彭真之所以表現得信心十足，首先可能是因為

自信當前由校園書生颯起來的風暴，乃是黨刻意放手、甚至一旁出力而成，因此無論其鬧得再大，等黨一反擊都會迅速雲散煙消。其次，彭真也作好了準備，不讓北京高校的「鳴放」熱潮外溢到校外，尤其是與中小學和工廠串連在一起，以免產生聯動效應而增加爾後收拾局面的難度。

彭真從兩方面下手，將高校的運動發展規限在校園而與外面隔絕。第一，彭真雖鼓勵高校師生參加「鳴放」，但仍對之活動做出限制：不要停課、上街，以及下工廠。第二，爲了讓高校的「鳴放」在得不到外界聲援下而孤掌難鳴，彭真指示：「不要在工人中和中小學中開展整風，以免分散力量」（5月24日），「工廠中不要放，中小學也不能放」（5月27日）（《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25, 229, 231）。彭真更親自出面向北京工人喊話與說明。

6月1日，彭真透過有線廣播向4,000、5,000名工人、店員演講。彭真在講話中，首重穩住工人的情緒，強調中共領導下「取得偉大的勝利，這是客觀的事實」，「土改」、「三反」、「五反」、「肅反」、「三大改造」都是明證。並提醒有心人士藉著整風之機向工人煽動、否定中共建國以來立下的成績。他強調工廠任務繁重，事關國家工業化和人民生活，因此現在一般不進行整風（《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1-232）。6月3日，在市委召開的工廠、商店、建築業的幹部大會上，彭真又到會講話並指出：現在有兩個鬥爭，一是黨內的思想鬥爭（整風），另一是階級鬥爭。他強調後一鬥爭的出現，是因爲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一方面在理論上否定黨的領導，說黨實在不像話；另一方面想到工廠、農村借整風煽動鬧事」。作爲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若如彭所言地面臨政治危機，工人豈能坐視不管？在場的工人聽後應該莫不感到義憤填膺。彭真也向工人「老大哥」「交了底」：「過幾天，光共產黨整風啊！黨的風都整好了，黨外這個那個就不整？」（彭真，2003a: 308, 316）也就是預告黨在不久之後，就要反撲整黨外了。

肆、彭真操控人大會議大批黨外「右派」

在整風醞釀期間與運動初期，毛澤東、彭真皆主張：人大與政協兩個組織以及在其中活動的黨外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應扮演更大、更實質的角

色（《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194, 221）。但是等到中共開始進行「反右派」鬥爭後，相關機關反而成爲中共組織批判「不聽話」的黨外人士的主要場域與舞台。作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真，就是有關「批鬥大會」的現場指揮官。

在「反右」開展的背景下，6月26日至7月15日，中共舉行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此一人大會議，事實上演變成一場批鬥、討伐「右派」的大會。會議正式開幕後，身兼大會主席團成員、秘書長，以及常務主席之一的彭真，注意調升會議「反右」熱度，也密切聽取會中「反擊右派情況的彙報」，並作出相應指示（《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44）。在北京市與彭真熟識的吳晗和梁思成，就積極配合彭真，在人大會期間擔任批判「右派」急先鋒的角色。

歷史學家出身、官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從中共建國以後即多次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但一直未能如願，使之一度心灰意冷。直到1957年3月，吳晗的入黨申請案在彭真和劉仁商議後，由彭親自向毛澤東彙報，方爲毛所批准（張道一，2009: 684-685）。總算一償入黨宿願的吳晗，對外不公佈其中共黨員的身分，仍繼續以民盟北京市委負責人的面貌見世。對於不久即來到的整風運動，吳晗自然希望能有所表現，以向毛澤東及入黨推薦人彭真答謝和表忠。當整風加入「反右派」的內容後，跨足中共與民盟的吳晗，實際成爲中共安插在民盟中央高層的一個暗樁。人大會議中，表面上作爲民盟人大代表的吳晗，也與主導會議的彭真裏應外合。

吳晗在大會發言的一開始就表明：由他領導的北京市民盟組織一向堅持接受中共的領導，因此遭章伯鈞、羅隆基指責爲「只聽中共北京市委的話」。吳晗接著就痛批章伯鈞及其主張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及其建議的「平反委員會」，還有章羅「合夥經營的黑店」的大小「跟班」和各地「分號」如四川的潘大逵。事實上，吳晗的砲火並不限於民盟「右派」，其他民主黨派的頭號「右派」如黃紹竑、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中央委員譚惕吾等無一倖免（人民日報，1957a）。

梁思成乃梁啓超之子，是一位享譽中外的建築學家。中共建國後，梁思成向來堅決主張在保護北京城原貌的前提下，規劃著手首都的建設。這與毛

澤東喜新厭舊、改天換地的想法相左。彭真往往從中扮演著代替毛出面向梁思成進行溝通、甚至施壓的角色，但梁思成也擇善固執、據理力爭。兩人經常互不相讓、甚至吵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湯壽根，2012: 72）。1955 年，彭真奉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命，領導一個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聯合組成的寫作團隊，撰寫、預備了數十篇批判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文章。然後，彭真登門造訪梁思成，告之黨已備齊檄文，但仍寄望其幡然悔悟。在彭真軟硬手腕交叉使用下，梁思成不得不屈服而自我檢討（于光遠，1997: 33-34）。在此過程中，彭、梁不打不相識，兩人之間反而建立了一定的情誼和關係。

梁思成在整風初期與「反右」前後都盡力表現並為彭真所注意。在 6 月 14 日北京高校負責黨幹的座談會上，彭真說明中間分子在當前「反右」鬥爭中的重要性時，就特別提到梁思成，稱其「表現很好」。兩天以後，北京市委邀請梁思成在內的百餘名黨外教授出席座談會。梁思成聽了彭真在會上所作的指示：為使「右派」迷途知返，要對之做工作，「但是不要調和」（《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13, 238-239）。梁亟思進一步地爭取表現。

在人大會議中，梁思成除了與其他幾位建築同行作了一個誓言跟隨中共、全力進行「反右」的聯合發言外（人民日報，1957f），他還另外要求在大會上做了一次補充發言。在這次發言中，梁思成自揭過去「一個人單槍匹馬地想搞一個在建築領域中的反黨運動」的錯誤，並公開感謝中共按住壓下旨在批判他的文章，沒有將他同當時正受批判的兩胡（胡適、胡風）、兩梁（梁漱溟、梁實秋）等同起來。梁思成強調：「我才知道黨對我的這種無微不至的愛護。」（人民日報，1957d）1955 年中共對梁思成放過一馬、讓後者「從心眼最深處感激感動」的事，如前所述，主事者就是彭真。彭真數年來對梁思成所做的統戰工作，在整風、「反右派」中終能收到效果。

在彭真各種形式的安排與鼓勵下，如前所說的吳晗和梁思成，以及許多黨外人士，紛紛在人大的議會殿堂上對大小「右派」不留情面地重砲轟擊。彭真在「反右」即將開始前夕（6 月 6 日），專程打電話至湖南長沙，召集兩位前國民黨降將、時任湖南省正副省長的程潛與唐生智盡快進京，一道加入即將開始的「反右派」（紀彭，2012: 55）。程、唐也不負黨的期望，在人大會場上大批「右派」（人民日報，1957b；1957c）。在彭真佈置的「反右」隆隆

砲聲下，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們面臨萬夫所指的處境。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有的「右派」如黃紹竑更尋短自殺未遂。

黃紹竑對中共的「肅反」政策向來沒有好評，整風開始後，在彭真、李維漢主辦的實為「引蛇出洞」的統戰部座談會上，黃氏更對中共「肅反」等問題做出系統的批評。5月27日，在毛澤東召開的地方領導人齊聚的整風彙報會上，彭真說「集中力量攻肅反、攻公安工作」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就是指黃紹竑。在彭真主導的人大會議中，這位前國民黨「桂系」的台柱自然成為眾矢之的，在大會和小會上都遭到辱罵和逼問。黃紹竑在人大開會期間吞食安眠藥意圖自殺一事，彭真全盤掌握。他要人傳話給黃：「第一句是這個辦法不行，要徹底好好檢討；第二句是有錯好好改。」值人大會議進行期間的7月7日，周恩來召集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和知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座談。彭真在此會上批評黃紹竑「想用自殺的方法來同我們作鬥爭」，意圖藉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抹上一臉的灰」。彭真強調：黃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都是「走另外一條道路」的人，「吃一點安眠藥是嚇不倒我們的」（周恩來，1957: 35）。被彭真點名「走另外一條道路」的人，在人大會的內外夾殺下，最後無不檢討認錯。

彭真利用人大的論壇，策動各類親共的所謂中間分子與民主人士，對那些已淪為「右派」的同僚與舊識進行「地毯式」的揭發。在此一過程中，彭真借重這些愛黨、愛國的黨外人士協助中共高揚「右派」先生們的「臭名」，除了因為他們與後者相識多年、知其根底，可以供出有份量、有實質的批判內容。他們的踴躍助戰也可以顯示：中共發起「反右」，不是以大欺小，而是有黨外的背書，是「吾道不孤」。與此同時，他們自身也可以歷經一次鬥爭的鍛鍊——與黨共進退、作黨的鷹犬；為了黨的事業而對敵兇狠。並且進一步地深信要以黨的是非為是非。彭真認可的社論就評道：「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工商界的代表在這一鬥爭中是站在擁護社會主義方面的，而且經過這一次鬥爭的鍛鍊，他們的認識更明確了。」（人民日報，1957e）

伍、彭真推進中央和地方的「反右」

一、指揮中央部門與群眾團體「反右」

彭真作為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領導人，在運動期間多次陪同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聽取黨政各部會與重要群眾團體的運動彙報或對之進行討論。對政府部門方面，例如：中央書記處在 6 月 19 日討論衛生部的整風問題，6 月 28 日聽取外貿部、文化部、地質部、建築工程部的運動情況時，彭真都在場參與（《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40, 243）。對黨的直屬機關方面，中央書記處最常過問的單位是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中央高級黨校在「鳴放」期間冒出許多批評黨的直率、甚至出格的言論，因而被黨中央視作要重點整頓的單位。中央書記處在 6 月 19 日、7 月 24 日、8 月 23 日一再過問高級黨校的整風問題。彭真不但出席前述的書記處會議（《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1, 240, 249），更在會中與鄧小平配合，強勢逼迫黨校領導加溫該單位的「反右派」熱度。舉如在 8 月 23 日的會上，鄧小平批評黨校的正副校長楊獻珍和侯維煜在是否劃一名學員為「右派」時態度猶豫不定。在旁的彭真直接對楊、侯施壓：問題不在該員是不是右派，「而是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杜光，2005: 6）這兩位黨校領導深怕自己被定為「中右分子」，回校後就大抓「右派」。

對群眾團體方面，隸屬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是後來的「共青團」）的《中國青年報》，在整風中刊載許多大膽的言論，因而在「反右派」中成為重點的檢查對象。該報的負責人更紛紛面對被劃為「右派」的壓力。《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因為有多人為之說項、陳情，終而避免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副總編輯陳模在「反右派」中被盯上後，團中央也嘗試想保之。由於陳模曾擔任過彭真的秘書，團中央便希望藉由彭真講話表態的方式，讓陳模解危。想不到，彭真在聽聞陳模的情況後，完全不念舊情地表示：「陳模不是右派，還有誰是右派？」在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下，陳模被劃為「右派」（邢小群，2008: 101）。

另一個重要的人民團體「中國作家協會」的運動情形，彭真也有所參與。

在「肅反」運動的背景下，1955年「作協」內部揭發出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乃涉及丁玲與周揚之間多年的個人恩怨。在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支持下，周揚藉機打倒丁玲，以進一步確立自身在「作協」中的權力與地位。在1957年整風氣氛下，丁、陳要求重議他們的案子，「作協」內部也出現對之支持的聲浪，進而向周揚提出質疑與批評。「反右派」開始後，立場與周揚相近的陸定一，將此案的爭論上報中央書記處，彭真出席在座。彭真過去在周揚、丁玲的衝突中，比較偏向周，也曾在周的影響下批評丁的創作。彭真此次聽了陸定一的彙報後，急切地問道：「周揚怎麼樣？他也要翻案嗎？」亦即彭真有些擔心周揚挺不住壓力而退讓（李向東、王增如，2006: 181）。不久，陸、周在獲得鄧、彭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的授權後，利用「反右」的機會大整丁、陳，成功地再次將「反黨集團」帽子硬扣在後者的項上。值得一書的是，魯迅的遺孀許廣平在「反右」中揭發批判丁玲時，就大作丁玲不尊重彭真的文章：「她〔丁玲〕驕傲自滿，目空一切，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彭真同志略為批評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她就對彭真同志非常不滿，見了彭真同志都不願打一個招呼。她心目中還有黨嗎？」（人民日報，1957i）

二、指導地方「反右」

在運動加入「反右派」主題後，彭真亦以中央領導人與運動的主要負責人身分，對北京市以外的各地運動予以指導。

在「反右派」號角吹響前夕的6月7日，彭真在上海對中共上海市委與幹部作關於整風問題的報告。彭真在講話中指出運動有兩個性質：「一是共產黨整風，一是很激烈的階級鬥爭」，「對黨提出批評的不僅有群眾，還有階級敵人（反動分子實質上是階級敵人）」。彭真提醒目前「階級鬥爭不能全線拉開，工廠、農村、中小學都要穩住」。但是對於在此界線範圍內的上海運動現狀，彭真直言：「上海放得不夠」，要抓緊時機（《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6）。「文革」中，彭真此次上海行遭指控為：「攻擊以柯慶施為首的上海市委，說他們怕工人鬧市，因此不敢放手讓〔大〕學生鳴放，鳴放得不徹底。」（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 37）柯慶施在中共黨史上向來以「左」的面貌著稱。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上，有論者指出彭

真表現得比柯慶施還激進（魏紫丹，2007: 80）。

「反右」開始前後，除了到上海，6 月上旬，彭真還先後在天津、江蘇、湖北、河南省市委召集的幹部會議上，傳達中共中央對運動情勢的分析和反擊「右派」的部署。6 月中旬，彭真則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召開電話會議，分批地與 24 個省市領導人就運動問題進行會商。在有關電話會議中，彭真一方面代表中央傳達對運動的觀點與對策，另一方面，聆聽地方的運動情況，並代表中央對之作出裁示。8 月 5 日，彭真曾專門過問、指導內蒙古的整風、「反右派」運動。彭對內蒙古的領導幹部表示：要打擊反社會主義的敵人右派；對於資產階級極右分子，不得溫情主義，否則就是階級立場不穩；對於黨內右派、嚴重的違法亂紀分子要從嚴處理。彭真的相關指示，無一不會對塞外的運動發展起到激化的作用（《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6, 238, 240, 252）。同月，彭真奉毛澤東之命，繼 6 月後又再次前赴南京。彭真此行代表毛向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施壓，說「這次主席要我來打招呼，他說你右」，並要之在江蘇省委內部放手查抓「右派」。江渭清毅然保護江蘇縣級以上的黨幹，但改從黨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下手（江渭清，1996: 416-418）。

陸、彭真領導北京高校「反右」

「反右派」開始後，彭真也甚為關注北京高校大學的運動發展。一、彭真動員高校的各級幹部，要之挺身為黨而辯、為黨而戰。6 月 12 日，彭真在北京市各大學黨員幹部大會上指出：右派進攻是一場「政治化思想鬥爭」。「前一階段，為了便於大家提意見，我們少放少鳴，不作解釋；現在既然有人向共產黨進攻，我們也是一家，就要與 99 家爭鳴，也是一『花』，就要與 99 朵花齊放，適當的批評是必要的。」兩天以後，彭真又召集北京高等學校黨委負責人座談。在這場僅限於高校高階黨幹參加的小範圍會議，彭真改口說：「右派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的領導，這一點要有足夠的認識。前兩天我說反右鬥爭是『政治化的思想鬥爭』，是不確切的，就是政治鬥爭。」他更強調：「人家不是幫助你整風，是要你的命啊」，「要認識到這是一場殘酷的激烈

的階級鬥爭！」（《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6-238）彭真的相關言論應能有效地激起這些校園黨幹的敵我意識，使之返校後即投入「反右」鬥爭。

彭真在動員北京高校黨幹卯足全力獻身「反右派」鬥爭的同時，他竟還暗中對後者施行政治「釣魚」和「引蛇出洞」。根據因此上鉤而屈作「右派」的戴煌（新華社記者，當時在外交學院學習）的回憶，「反右」開始後不久，彭真曾對北京市所有高校黨支委以上的黨員幹部發表演講，講話主題是：動員黨內同志繼續向黨的組織領導提意見，不要受到社會上「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影響。彭真首先表示：「那些人和我們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條心。他們裝著響應我們黨『歡迎發表不同意見』的號召的模樣，骨子裡卻要推翻我們的黨，或與我們黨平分秋色，輪流坐莊。」他接著表示：

那些人能和我們今天在座的同志們相提並論嗎？我們都是自家人。一方面，黨的組織領導確有許多自己尚未覺察的不足之處，需要大家提意見，多幫助；另一方面，黨內也確有許多人蛻化變質，胡作非為，騎在人民脖子上拉屎拉尿，害得在他們魚肉之下的人民怨聲載道，有冤難伸。這就更需要予以無情地揭露，並請大家幫助黨組織想想辦法，認真解決這個大難題……。再說，黨的方針政策及其貫徹執行，也並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風順的。這也是需要大家幫助黨的領導洞察秋毫，力求改正完善的。

彭真進而強調：

總之，「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內外有別」。而且黨支部書記與支部委員同志們要帶頭提，為整個支部的黨員同志做出表率，把我們黨的這次整風運動堅決搞好、搞到底！即便提的意見不一定都正確，甚至錯了，那也不要緊；黨絕不會把這些同志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混為一談，這一點，我可以代表黨中央在這裡向同志們作保證……。

根據戴煌的回憶：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中僅次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身分，以及「他這等熱誠坦率、語重心長的講話」，「誰還能不信以為真地心頭熱呼呼？一切茫然疑慮都立刻煙消雲散」。他在散會後回到單位便開始對黨組織直率地提出意見，並認為：「我這都是遵照黨的指示說話的，即便態度率直了些，語氣重了些，也都是為黨好，不會有任何問題」，況且彭真是「代表黨中央作了保證的」。（戴煌，1998: 320-321）彭真的話言猶在耳，這名聽話的忠心黨幹不久就被扣上「右派」帽子。

彭真這種祭出「內外有別」的說詞與手法，成功地鬆懈了下級黨幹擔心步上黨外「右派」後塵的提防心理，有助在黨內繼續貫徹「釣魚」之策。正因為其「釣魚」、「引蛇」的效果快又有效，彭真此一講話後來還下發給地方學習與參照。事實上，1958年春，就仍有雲南的縣級幹部使用彭真這份誘騙「內外有別」的講話，鼓勵、引誘下級黨員發聲，再從中挑選打擊（董克讓，2009）。

二、彭真同北京高校內的黨外教授座談，要後者在運動中知所進退，服膺中共的領導外，也配合其「反右」鬥爭的展開。在彭真的命令下，北京市委在6月16日上午召集120多名黨外的教授與副教授進行座談。彭真在會上回顧整風以來的發展，指出90%以上的意見是建設性的言論後，話鋒一轉表示：

但也有相當數量是惡意的，最突出是否定一切政績，攻擊共產黨的領導，要共產黨退出工廠，退出學校，放棄對文藝界的領導，污蔑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是「家天下」、「黨天下」。總之，他們不要共產黨領導，不要社會主義，這就使整風運動中出現「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出現了一場政治鬥爭。

彭真更強調：「有人說，要同共產黨打三個回合」，「爲了要和右派分清是非，三十個回合我們也幹！」彭真最後交代這些黨外教授一項政治任務——利用自己的關係與人脈，出面規勸那些對黨有「成見」的高級知識分子，盡快地向黨伏首稱降（《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8-239）。

三、彭真直接插手、指揮個別學校的「反右」進度。

囿於篇幅的限制，此處著重介紹彭真對北京市三所重點大學運動的介入情形。清華大學方面：對於清大的運動走向，彭真一直予以高度的關切。前述的5月底彭真召集的高校負責人「招呼會」上，彭曾當面讚揚一位數日前在清華園裏公開與學生進行政治辯論的團委幹部，稱之「像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令後者感到驚訝（阮銘，2010: 182）。由此可見彭真對該校運動情況的仔細掌握。根據一名清大黨內「右派」轉述蔣南翔秘書的話：在「反右派」開始之前，北京市委幾乎夜夜召集蔣南翔開會。在一日的會後，蔣南翔對秘書說：「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評我了，說我為什麼總捨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孫』。」（郭道暉，2009: 58）從相關的資訊中可以看出：彭真不下一次地批評蔣南翔未能狠下心地將一些出身學生運動的清大黨幹作為「右派」看待。從事後的發展來看，被彭真鎖定的就是該校黨委常委、校長助理袁永熙（原清大黨委第一書記，蔣中正重要文膽陳布雷的女婿）。「反右」開始後，彭真委託劉仁繼續召集清大高幹到市委開會，堅定後者「反右」的意志並採取一致性的行動。市委更派人到該校的緊急黨委會上宣佈其決定：開除袁永熙黨籍和停止11位黨委委員與黨總支幹部的黨籍。一名當事者在52年後回憶時仍心有餘悸地表示：「其泰山壓頂、突然襲擊的威勢，使我們猝然不防，驚詫不已。」（郭道暉，2009: 59）《人民日報》也隨即刊載揭發袁氏「右派」面貌的快捷戰報（人民日報，1957g）。

何以彭真對清大的運動發展介入如此之深？前述的當事人給了一個答案：為了「號召開展反擊黨內右派的大鬥爭」，「清華就成爲毛澤東和北京市委〔彭真〕推動反右運動的『先進』樣板」（郭道暉，2009: 59）。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表示：「有一句名言，『千金難買的好時機』，『寸金難買寸光陰』，大鳴大放，清華大學叛變了幾個支部，不然審也審不出這些叛變份子。」（顧行、成美，1991: 96-97）這算不算是對由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監督、蔣南翔具體操辦的清大黨內「反右」成果的一種肯定呢？

彭真除了深度地介入清大黨內的「反右」，他對該校黨外的「反右」也有所干預。前述的5月底彭真召集幾間北京高校黨團領導人的「招呼會」上，他就面諭清大的團委幹部回校後要積極邀請學術聲望甚高的黨外教授錢偉長

公開演講，並囑咐一定要將錢的言行全程記錄下來。⁴ 錢偉長最後也因言語被抓到把柄而被打作「右派」。

北京大學方面，彭真對北大燕園的運動情況也瞭若指掌、牢記在心。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在 5 月下旬帶領近 20 多名該校學生，到清華大學介紹北大的「鳴放」運動並進行串連，促成了「自由論壇」的出現。此論壇希望扮成類似英國供民眾自由發表政見的海德公園。對於黃繼忠的相關大膽舉動，彭真後來指示：「黃繼忠是北京高校第一個帶學生出校門的，應該嚴懲！」黃氏最後被打為「極右份子」。黃身為班主任帶領的班級（共 24 員學生），有 2/3 被劃為「右派」（丁抒，1995: 282）。

人民大學方面，彭真在 7 月一次北京市委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參加的「反右」整風動員會上，將「鳴放」期間在北大、人大做過 6 次演講，辯才無礙、常將校內黨幹辯得啞口無言的人大學生林希翎，公開點名為學生中「天字第一號的大右派」。既然彭真都發話了，縱使人大校長吳玉章再怎麼不同意，也改變不了林希翎被劃為「右派」的命運（黃子琴，2012: 102, 484）。

柒、彭真對運動激化蔓延的助長

一、政法領域的「反右」

整風、「反右派」在政法領域內執行的方向，就是揭發、批判各種意圖脫離黨的領黨、強調法律和司法自身獨立性的主張和人士。彭真在中共中央分工管理政法，因此他就是政法系統運動的最大監軍。彭真的相關政治活動主要包括：聽取政法部門的運動彙報並予以指示；審定《人民日報》關於政法部門運動的重要社論；在運動期間舉行的中央會議上，針對政法領域運動發展進行發言與報告。

1957 年，政法領域裏涉及層級最高的「右派」冤案，就屬國務院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王翰的案子。王翰在中共建國前先後在文化、學運，以及軍隊工作上為黨效力；建國後，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監察工作上。由於

4 阮銘提供的訊息，台北，2006 年 11 月 22 日。

王翰向來主張監察部門的獨立地位和實質職權、重視使用知識分子、提倡幹部學習業務、反對政治運動，力防冤案的發生。在整風、「反右派」初期，他又力保下屬，因此在政法系統中被中央當作是運動「祭旗」的人選。隨著王氏被政治清洗，各地的監察機關在運動中連帶地遭到重大的衝擊，有的省份的廳級監察機構竟有 20%-30% 的幹部被劃為「右派」，傷亡極其慘重（丁抒，2006: 236, 314）。王翰被打為「右派」後，下放三門峽水庫勞動，長達 16 年，直到 1978 年以後才恢復名譽。在王翰「右派」冤案鑄成一事上，中央政法書記彭真自是脫不了干係。

1957 年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監察部及其系統逐步開展「反右派」，在部長錢瑛坐鎮下，部內涉案入罪的黨內人士層級愈來愈高、人數也越來越多（人民日報，1957h）。王翰對此傾向和作法表示疑義而引火上身，成為部裏「反右」繼續上挖、深挖的最大目標。9 月 10 日，彭真聽取監察部的運動彙報。彭真對該部方興未艾的運動作何指示？彭真的官方年譜僅披露彭表示：「反右派的關鍵在黨內，右派的危險也在黨內。對黨內的右派，不能講溫情主義，不能政治上不嚴肅。」（《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56）其雖沒有明說是針對王翰，但由於王氏平常在部裏主持日常工作，地位關鍵影響大；他黨齡已有 25 年，政治資格老，迷惑其他黨員的危險性高。更重要的是，他此時已被部黨委視作部內的「右派」「首犯」。因此，彭真所指的監察部「黨內的右派」，就算不是專門針對王翰而來，也必然包括他在內。既然彭真有令：「對黨內的右派，不能講溫情主義，不能政治上不嚴肅。」監察部以錢瑛為首的黨組對待王翰的方式，之後就更全然不講溫情，嚴厲到不將之影響徹底肅清不罷休的地步。

從 10 月底至 11 月底，監察部連續召開了 16 次鬥爭王翰的全體工作人員大會，批攻的大字報多達 1,100 張。此外，監察部還舉行王翰的「罪證展覽會」，歷數王的錯誤觀點、工作弊病和生活特權等問題，並組織各地的監察人員分批前來參觀，以搞臭王翰的政治聲譽。監察部對王翰狠相如此對待，彭真心知肚明。在監察部召開的一連串鬥爭王翰大會的中間，11 月 10、11 日，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包括監察部在內的政法部門的「反右派鬥爭的情況彙報，討論右派的劃分問題」（《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69）。從彭

真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結束後，鬥爭王翰大會仍繼續進行直到同月底才告止來看，彭真是支持錢瑛為首的監察部這種「對敵（黨內「右派」）鬥爭狠」的態度與作法。在有彭真開綠燈的背景下，錢瑛和監察部下一步就是將一系列批鬥大會中湧現的揭發王翰材料，作進一步的甄別整理與系統總結。12 月上旬，監察部的「反右」成果，以刊登在《人民日報》的方式公諸於世（人民日報，1957k；1957l；鄭紹文，1957）。

在次年 2、3 月舉行的第七次全國監察工作會議上，「清除王翰右派反黨集團」被突出強調是：「監察工作上兩條道路鬥爭的巨大勝利，也是今後監察工作向前邁進的重要保證。」彭真到會肯定包括王翰劃「右」案在內的監察工作的成績（人民日報，1958）。

彭真麾下的北京市的政法戰線，也在運動中成為「重災區」。10 月 9 日，《人民日報》社論《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指出：「在北京、廣州等地都發現有的右派分子充當了地方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公然為反革命分子開脫罪責；有的對反革命罪犯採取重罪輕判的方法，使該判死刑的只判了很輕的徒刑。」（人民日報，1957j）由於該社論乃經彭真審閱（《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63），因此相關文字可看作是彭真對北京市政法部門的一種批評，同時也是他對首都政法工作者發出的「反右」動員令。經「反右」浪潮的強力拍打後，北京市的司法部門劃了 83 名「右派」，佔其司法人員總數的比例高達 9.25%。其中包括了北京市的高級法院院長、中級法院院長，以及市司法局的正副局長。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高級法院院長王斐然，因主張「審判獨立」、「以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被法院黨組初定為「右派」。王的案子報送到彭真為首的市委後，彭真一開始表示對之要予以保護，劉仁也說：「王斐然是老實人，不是反黨的」。但是到了 1958 年的運動「補課」時，這名曾被彭真評為「北京黨內真正懂法律的」王院長，後來還是沒有逃過一劫，被戴上了「右派」大帽而被迫去職（丁抒，2006: 251-252, 313）。事實上，王斐然也成為北京市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最高級別幹部。

對於王斐然是否需要戴帽一事，彭真為何改變了態度？根據北京市委高幹配偶的看法：「由於北京市幹部也必須劃上些右派，才能搪塞中央的要求，

所以才拋出這一個的吧。這種辦法，各級都不能不如此。」（韋君宜，2000: 66）但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當彭真在政法領域高舉黨大於法的旗幟、加大「反右」力道時，屬於自己旗下的王斐然如果未因強調法律至上地位與作用而受懲，恐怕難以服眾，尤其是對政法領域中那些由彭自己煽起熱勁的運動積極分子。工作細膩的劉仁在王斐然被劃為「右派」後，特意請後者至家中用餐、表達關心之意（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教處，2002: 127-128）。彭真見王痛心檢討、洗心革面，之後也將之提拔為北京圖書館副館長（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 37）。

二、高校的整風「補課」

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宣稱「經過三個多月的鬥爭，情況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各民主黨派、高等院校、其他知識界和省市以上機關，鬥爭一般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10月8日的全體會議上，彭真發言表示：「6月8日前，『右派』趁大鳴大放之機猖狂進攻，教職員和學生思想很混亂，迅速轉入反擊『右派』是必要和正確的。」對於高校接下來的運動重心，彭真指出：「現在，大專院校反擊『右派』的鬥爭差不多了，但接受群眾的批評和意見、改正缺點錯誤的工作，做得很不夠」；「我們反擊『右派』只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另一半，甚至可以說是一大半，是改進工作問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我們在高等院校還欠著債。準備在北京34所高校中再發動一次鳴放高潮。」兩天以後，彭真當面交代北京市各高校的負責黨幹：「『反右』鬥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現在的工作中心是解決整改問題。」（《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63-264）

彭真雖表示北京高校的「反右」「差不多了」、「已取得基本的勝利」，但不表示不用繼續在校內抓劃「右派」了。例如：北京大學在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的任內，其師生已超過500人被劃為「右派」，其中有些「右派」更是彭真領導的市委，甚至是彭本人親自介入決定的。但江的運動積極性仍然被彭真嫌不足。1957年10月下旬，鐵道部副部長陸平調任北大，取代江的黨職。北大的運動在1957年金秋後雖然進入所謂的「整改」階段，新官上任的陸平仍戮力在校園中進行「反右補課」，從1957年底到1958春，短時之內又有170

餘名師生被劃為「右派」。陸平在北大的運動所為，與彭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有資料指稱，彭真與鄧小平在 1957 年秋參觀北大時，看到校園內運動大字報後曾表示：「北大右派的質量很高！」其意指北大的「右派」「貨真價實」、「名實相符」。他們更指示：在北大劃「右派」可以超出 5% 的比例，甚至可達 7% 以上（高瑜，2012）。一名北大物理系的「右派」更直接指控：是彭真親自下令北大開展「反右補課」，並派出一個工作組強力監督執行此事。在此背景下，北大物理系學生的「右派」人數和比例，在全校內皆佔首位。這名學生本身也是在這一波北大「反右」中落難（林木，2012）。

在北大「反右補課」問題上，原北大黨委成員不諱言地指出：「陸平同志作為新任的黨委第一書記，自然要積極貫徹領導上的指示，使北大黨委不再繼續被認為『右了』。」（王學珍，2007: 13）陸平在冀察晉根據地活動時，就經常請示彭真；他到北大工作後，在組織上更直接受彭真領導（陸瑩，2007: 124-125）。在整風初期貼大字報提倡民主、自由與人道，後來在運動後期陸平任內被補劃為「右派」的物理系學生燕遁符說：「陸平也真的不負重托，領導北大反右十分得力」，「與彭真配合得十分默契」（俞梅蓀，2011）。

繼 1957 年至 1958 年的整風、「反右派」中對北京高校裏思想獨立、活潑敢言的學生進行政治打擊後，彭真在 1963 年又與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續以抓「反動學生」為名，對北京高校學生進行思想箝制與政治迫害（平乃彬，2011: 61-62）。其思維和作法「幾乎是 1957 年劃右派的重演」（錢理群，2007: 421）。被認定為政治反動的大學生，如同前幾年「右派」學生的遭遇，就被送去北京市郊的勞改營接受監督改造和從事苦不堪言的體力重活。

三、中小學的整風、「反右派」

5 月 14 日，毛澤東曾批轉一篇上海中小學老師對中共提出批評意見的報導，給彭真在內的 5 位中央領導人。這些中小學的教育工作者對黨工作指責之深刻，連毛閱後都感到「不整風黨就會毀了」（《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22）。但是中共中央暗地進行的「引蛇出洞」，乃以高級黨外人士和高校的知識分子為優先誘獵的目標；對於以小知識分子為組成主體的中小學老師，則

放在後一階段再來處理，以免大小知識分子在整風中不期地合流，進而在輿論上蔚然成爲一股黨難以駕馭之風。

有鑒於此，在運動的「引蛇出洞」階段，彭真在中央高幹會議上指示地方要人：爲了不「出什麼毛病」，中小學「不能放」（5月27日）；對中央和北京市的機關幹部表示：不要在中小學「開展整風」，「以免分散力量」（5月24日）。其後他又再次指示北京市人員：「中小學暫時不搞」（6月1日）。到了「反右」即將打響之時，或因爲已從黨外政學菁英和高校師生中蒐集、累積了一定數量的「反動」言論，並足以對之作政治算帳用，中共開始允許中小學老師在組織的安排下放口鳴放。彭真就說：「中小學教師如要放，由市委、區委召集座談會」（6月7日）（《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22, 229, 231, 235）。但在1957年夏天的「反右」攻勢中，中共主要聚焦在政治討伐民主黨派、機關高校裏的「右派」。至於中小學裏的政治雜音，只好留到秋後再來處置。

在9月、10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頻仍地召開會議，討論和制定《關於在中等學校和小學教職員中開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通知》。該《通知》認爲：爲數兩百多萬的中小學教職員的社會出身和政治思想情況，可能比大專學校還要複雜，因而有必要接受運動的「洗禮」和考驗（沈志華，2008: 655）。彭真積極參與此一中央文件的產生（《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57, 265）。彭真對中小學教育人員這一群體的敵意和不信任，可見於11月28日他對北京全市黨政領導幹部的講話。彭真在其中提到「遼寧的負責同志」告之：「小學教員方面不是人多〔的問題〕，是調整質量問題，中學也是一樣。」（彭真，2003b: 871）遼寧領導人對中小學教職員的思想問題，看得特別嚴重（沈志華，2008: 655-656）。彭真顯然接受了前者的看法和判斷。

12月7日，北京市委教育部響應彭真的指示，提出在北京市的小學裏推行整風、「反右派」的運動計畫。其中痛陳首都「小學教師隊伍的複雜和思想的混亂狀況」，強烈主張從市內機關企業的黨員幹部中抽調人力，以作爲接管存有嚴重問題的小學的準備力量，並建議在寒假集中教師，「採取專題鳴放的形式，揭發學校幹部和教師的各種違法亂紀和反動的思想言行，展開大辯論和反右派鬥爭，從而整頓幹部和教師的隊伍，初步整頓學校的工作秩序。」十天後，彭真爲首的北京市委同意市委教育部此一針對小學的運動部署（中

共北京市委，2003: 899-903)。到了 1958 年 2 月底，北京市的中小學裏劃定的「右派分子」就達 1,637 人（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2011: 207）。

1958 年 2 月 12 日，彭真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召集 9 個省市的黨領導人開會。或以斯時首都中小學的「反右」發展為例，彭真在會上對這些地方要員表示：「中小學教員隊伍要清理」，「要處理壞人，決心把這條戰線搞好。」（《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86）2 月 16 日，彭真進而指示：「中小學教員必須徹底整風。不能為人師表的，都不要做中小學教員。把後代給反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不滿的分子或者壞分子去教育，是不應該的。」「處理中小學教員要和機關人員一樣，保留工資，下放參加勞動，或調作其他的工作。已經批判的右派，要開始做爭取工作。一做爭取工作，內部就會起分化。如果這裏爭取，那裏還未鬥也是問題。中央準備發一指示，沒批判沒揭發的還要揭發批判。」（彭真，1958: 78）⁵

在中共中央、尤其是彭真代表出面的聲聲催促下，大批的中小學教職員在 1958 年初的寒假前後被打為「右派」，進而造成全國「右派」總體人數在短時內的筆直增長。同年 5 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就表示：「反右」高潮後，在小學教員中還搞出了十幾萬「右派」。此數目約佔當時全國 30 萬「右派」的 1/3（沈志華，2008: 657）。一再鼓勵在中小學教職員裏大搞整風、「反右派」的彭真，也察覺到運動在此一群體中走火了。在北京市，彭真指示政法部部長劉涌和負責中小學整風的教育高幹楊伯箴前去調查。劉、楊將有些學校領導竟把凡是穿綢緞衣裳的教師都打成「右派」的現象向彭真報告，彭聞後予以批評並指示市委教育部要逐校問查（劉涌，2002: 259-260）。劉涌晚年回憶此事稱讚彭真務實之時，不知是不知情或是不願正視一個重要的事實—彭真正是當初大力號召在北京市以至全國的中小學教職員裏大肆獵捕「右派」的主要中共領導人。

5 對此，彭真的官方年譜僅僅寫道：「講話還談到清理中小學教師隊伍和對右派做教育爭取工作，要把他們中的多數人改造好。」完全不見彭真在同一場合中提出要繼續在中小學教職員中抓鬥「右派」的言語（《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88）。

捌、彭真對「右派」的劃線和審定

一、彭真在「右派」劃線上的主張和問題

何種言行算得上是「右派」？中共在運動中遲遲沒有拿出一個劃定「右派」的標準。事實上，以言治罪是無法有一條真正客觀、明確的界線，因此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打作「右派」。彭真在「反右派」開始後的一段時間，採取了選立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為「中右」標桿的方法，也就是只要鳴放言論的尺度沒有超過傅鷹，就不算是「右派」。他希望如此可使「右派」的帽子不至過於濫扣和濫戴。彭真選定傅鷹，乃因後者的言論幾度被毛澤東認為是愛國而非貳心、尖銳但出於善意；傅鷹在整風中也表現得與黨靠攏並曾發言稱讚彭真（王澈，1957）。因此，在「反右派」發動沒多久，彭真就在內部作出「傅鷹不是右派」的裁示（《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8）。

豎立傅鷹為「中右」標桿的運動效果如何？據聞彭真自己曾說：「立了傅鷹這個標兵，使反右派鬥爭沒有擴大化，保護了一些人。」（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 37）親彭真的人士和著作也說：相關作法讓北京市的一批知識分子，避免了被劃為「右派」的命運（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2000: 353；王漢斌口述、韓勤英整理，2012: 70）。然而，彭真另一項「右派」的劃線做法——設定劃抓「右派」的指標，大大限縮、抵消了「傅鷹條款」的政策預期作用。

根據運動的相關著作和運動當事人的說法，彭真對北京市各單位抓劃「右派」的人數比例，定下5%的指標（丁抒，1995: 280）。彭真此舉的目的，或許原本是要限定運動的打擊面，然而，其卻促成下級黨幹機械地硬湊「右派」人數，以達到此一指標的現象。易言之，原先的政策「好意」是用指標規限運動，但想不到竟出現指標激化運動的局面，進一步促成運動打擊面的擴大。就以在北京高校中抓劃「右派」為例，為了達到彭真規定的運動指標，北京市委的高校黨委內部出現了爭論。有一派主張應要多在教授而非學生中抓劃「右派」，例如市委大學部部長楊述就表示：「年輕人犯錯誤該保護」，「傅鷹那樣老罵街的都不劃，還劃學生？應當劃傅鷹。」另一派則反之，認為

應當多在學生而非在教授中抓劃「右派」（韋君宜，2000: 54）。作為北京市委「大家長」的彭真傾向後者。彭真就指示：有一些教授可以保下來，「因為他們還可使用」，並批示「不足之數由學生中補」（王迅，2012）。

二、彭真在「右派」審定上的權力和影響

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審定黨政各單位呈報的「反右」果實時，有副總書記地位之實的彭真，有時即可以在政治上定人生死。如前所述，《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陳模的政治命運，因彭真一句「陳模不是右派，還有誰是右派？」就無法翻轉了。時任中央廣播事業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編和對外廣播部門負責人的溫濟澤，被其所屬的中央廣播事業局黨組劃為「右派」，經中宣部認可後報送中央書記處定奪。最後也由彭真批定（李輝，1993）。

彭真也是有助人一臂、使之免於在「反右」大浪中滅頂的時候。市委大學部部長楊述的妻子韋君宜，在「中國作家協會」就丁玲、陳企霞翻案問題而出現內部爭論時，認為應當要持平處理，再加上她講話率直，結果被「作協」中的運動好戰者糾纏上，處境岌岌可危。楊述在北京高校中認真積極地「反右」，但見韋君宜有被打為「右派」之虞，便求助了他的直屬長官彭真。楊述在延安時期即結識彭真，他又是彭真治下的首都高教負責人。楊述將韋君宜的危險狀況告訴了彭真，彭真對下屬的配偶伸出援手。他表示：韋氏「平時和黨的關係是好的，就不劃右派了」。並要楊述幫助其妻「認識錯誤」（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 37）。韋君宜雖躲過「右派」高帽，但活罪難逃：她一方面繼續得在批鬥會上挨批，另一方面，又要戴罪立功，發文批判他人。

對於北京市「右派」的審定和處理問題，彭真更是一錘定音。前文提及的帶學生出校門串連的北京大學講師黃繼忠，因被彭真點名要嚴懲，最後被打作「右派」的最底層——「極右份子」。整風期間鋒頭甚健的「右派」學生——人民大學的林希翎（彭真稱之為「天字第一號的大右派」）和北京大學的譚天榮，他們的處理意見在 1958 年春由彭真公開宣告：「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當反面教員。」彭真還表示：黨對此二人甚是寬大，沒有法辦與押

送勞動教養（黃子琴，2012: 107）。即便有此「優待」處理，林希翎仍一直不願低頭就範。公安部長羅瑞卿主張對之進行「強制性的改造」，獲得彭真的同意。不久，林希翎即遭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之後更以她犯了「反革命罪」為由，對之進行長期的關押和勞動改造（黃子琴，2012: 110-111）。

在研商首都市民是否要戴上「右派」帽子的問題上，事實上，彭真也有慈眉善目、高抬貴手的一面，但主要限於針對少數的名人之流。例如：知名京劇演員馬連良和導演焦菊隱，最後都由彭真發話而過關（章詒和，2005: 41-47；華夏經緯網，2012；孟紅，2007: 50）。得到彭真庇護的人，畢竟是屈指可數的幸運例子。直接或間接因彭真的關係以言入罪並戴上右派大帽者，人數更多。他們其中又有不少是年輕的學子，本有的大好前程，一夕丕變，長期淪為政治賤民，身心皆備受折磨。

玖、彭真在運動中與毛澤東、鄧小平的互動和影響

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期間，彭真主要向兩位黨內上級負責：一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另一則是彭真在中央書記處的長官鄧小平。彭真在運動中和毛澤東、鄧小平的互動情形和其對運動的影響問題，分述如後。⁶

一、彭真和毛澤東之間的互動

毛澤東在推行整風、「反右派」的過程中，對彭真甚為重視和重用。毛澤東在運動期間經常召開限於少數人參加的高層決策會議，彭真是固定出席的一員；毛主持起草重要的中央運動文件和指示時，彭真不但能有獲閱和提意見的機會，甚至有出現毛指定交由彭真把關、決定相關的運動指導文件，是否適宜下發、批轉的情況（毛澤東，1992: 537-538）。彭真在中央書記處襄助鄧小平推行運動，但毛有時候會直接找彭真商議運動事務，甚至交辦任務。譬如：毛指派彭真去江蘇催促其省委領導人加強該地「反右」的力度。對於

6 作者感謝審查人所提的建議：探討彭真和毛澤東、鄧小平在運動中如何互動，以及對運動造成的影響。

北京市的運動情況，尤其是高校的運動進展，毛尤為關切。他會找彭真詢問情況，進而對之耳提面命（李維漢，1986: 834）。

毛澤東如此看重彭真的動機，主要有兩點：第一、毛澤東希望借重彭真過去參與領導延安整風的經驗。中共在 1957 年發動的整風運動，其糾正黨內不良之風、清除黨內不肖之徒的運動宗旨，以及其開門引進黨外建言、發動群眾參與的運動方法，基本上無異於 1940 年代中期推行的延安整風運動，甚至可以說是它的翻版。彭真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可說是劉少奇以外，毛澤東最得力的左右手（鄧小平當時不在延安）。彭真當時爲了踐行毛澤東的整風理念不遺餘力，即使引人詬病、傷及無辜也在所不惜，他也因此深得毛的信任（高華，2000: 382-388；何方，2005: 349-361）。毛在十餘年後重啓整風運動並尋覓幫手時，彭真自是其所想的重要人選。第二、毛澤東欲以彭真領導的北京市爲整風運動的試點和起點。中共建國以後的幾次重大政策和運動，包括：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運動、「五反」運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皆以北京市爲先導和模範。彭真每每竭力應和、交出實績而受毛稱許（陳永發，2001: 636-639, 647-652；李海文、王燕玲編，2002: 128）。毛亦希望彭真治下的北京市，在 1957 年的整風、「反右派」中能再立新功。

彭真也確實不辜負毛澤東對他的政治厚望。從前文的討論中可看到：彭真無論在中央或是北京市執行毛澤東的整風、「反右派」政策和指示時，皆恪遵不懈，有過之而無不及。彭真的動機除了可能基於對組織紀律的服從（不遵從之即有遭清洗的風險），彭真在運動各階段的認識和主張，乃與毛保持高度的一致：先是認爲黨的確需要藉由整風除弊革新，後又基於階級鬥爭的思考慣性和捍衛政權的敏感心理，以爲黨遭逢「右派」的逼宮，不但對之要果斷回擊，更須除惡務盡。彭真在開門整風的階段，或許還有一種自身過去的施政作爲（如在「肅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有遭到政治清算的危機感。因此，當毛指控「右派」其心可議、妄圖推翻中共統治，彭真不難有同仇敵愾之感。此外，彭真也很可能在運動中抱有爭個人表現，以獲得毛澤東的佳評並成爲黨內同僚楷模的政治計算。他一手負責打理的北京市運動，就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如前所述，彭真領導的北京市乃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其工作較諸他地易

受毛澤東的關注和期待。北京市聚集著名的黨外高級人士和全國重點高校，使之在全國的統戰工作、文教工作、知識分子政策上，一向佔有帶頭示範的地位。整風、「反右派」運動主要涉及以上的對象和工作，彭真深曉北京市動見觀瞻的地位，也懷有「爭當天下先」的盤算，因此，在整風的前後和期間，彭真即有意識地要將北京市的運動實踐，打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樣板。如其自己所言：「北京市要做典型。」

彭真努力、積極地在首都地區培養、創造和總結運動經驗，既向毛澤東獻計、也向毛表功。彭真將其麾下的北京市，經營成毛的運動構想的第一塊試驗田後，如此直接使得當地的運動升溫發展，至少處於不落人後的狀態。經毛認可後，烙有彭真個人印記的北京經驗，再作為其他省市運動的學習榜樣，進而產生全局性的影響。彭真催逼出來的清華大學的黨內「反右」戰績和北京高校的「反右」「補課」，就是明顯的案例：前者作為中央登載報章、要各級黨委效尤的黨內反「溫情主義」的範例；後者則是中央要各地高校在「反右」問題上「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參照尖兵。

二、彭真和鄧小平之間的互動

彭真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原本比鄧小平高，但在 1950 年代中期，出現了鄧小平後來居上的微妙變化。彭真在 1945 年的中共「七大」，就已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躋身中央領導之列。鄧小平雖遲至 1955 年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方成為政治局委員，但是他在次年的中共「八大」更上一層樓，被選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較諸續任政治局委員的彭真還高一階。在「八大」新設的中央書記處內，鄧小平也作為彭真的上級領導。即便鄧小平的地位躍居彭真之上，兩人之間似無存在明顯的緊繃關係和較勁意味。此乃因為鄧小平在短時之內的「搏扶搖而直上」，主要肇因於毛澤東對之的不次拔擢。對此，彭真恐不敢有所異議。其次，鄧小平的政治能力和表現為人所共睹，彭真自身也因此而受惠。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鄧小平在 1953 年底至 1955 年對高崗問題的揭發和處理，實際上等同為彭真剷除了重要的政敵。⁷ 這事應讓彭真甚為感

7 1945 年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彭真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東北局書記，負責搶佔東北地區的任

激，也較能心服地接受鄧小平政治崛起的事實（鍾延麟，2010: 553）。在 1957 年的整風、「反右派」中，鄧小平和彭真之間表現得合作無間，更讓雙方的關係益加友好。

第一、因為中央書記處的職責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工作」，身為書記處正副領導人的鄧小平和彭真，共同負責執行整風、「反右派」政策，對於運動推行的結果，兩人一起承擔、休戚與共，因此不致有相互掣肘的情事發生。事實上，在運動期間，鄧小平和彭真的政治意向毫無二致，相較於彭，鄧投入的熱度也不相上下（鍾延麟，2013: 69-148）。鄧小平晚年就不諱言自身在運動中是一名積極份子（鄧小平，1994: 277）。鄧小平和彭真各自對運動抱持的積極、熱烈態度，在彼此觀摩和刺激下，不但可能有增無減，更甚至有互相加乘的效應。由他們率領的中央書記處，在督管和稽催中央和地方運動進展時，很難不受這種愈加激揚的政治氛圍的影響，進而對運動的全局發展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二、在整風、「反右派」期間，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內對彭真相當地倚重和放手，讓後者有很大的揮灑空間。一方面，鄧小平和彭真經常一道指揮、調度下級黨官，例如：在「引蛇出洞」階段，他們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使統戰和高校部門抓緊時間舉辦座談會「釣魚」，並要宣傳部門即時整理、發表「右派」的言論並撰寫反擊文章。在「反右」開始後，他倆緊盯中央黨政部會的運動情況，努力讓之保持高溫的狀態。另一方面，在鄧小平的委託下，彭真有時直接代替鄧主持書記處會議，或以書記處的名義召開為時冗長的全國電話會議，聽取運動報告並回覆相關請示。鄧聽力不佳、又沒有夜間工作的習慣，因此將此一工作委交予彭。經過此次整風、「反右派」的默契合作，鄧小平和彭真在中央書記處內分工愈益形成：鄧小平領導、主持做出決定後，由彭真負責細節決策和具體籌辦；鄧小平有事或外出時，即由彭真代理主持書記處工作，亦即由彭真實質擔任副總書記的角色（李向前、王桂華，2002: 78）。

務。但在此期間，彭真和高崗、陳雲、林彪在東北經略方向上出現嚴重的歧異和爭執，最後以彭真被中共中央調離東北局收場。因此事之故，彭真和高崗的關係甚為緊張，特別是高崗對彭真的敵視，讓後者備感壓力（趙家梁、張曉霽，2008: 53）。

在 1957 年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整風、「反右派」政策上，鄧小平、彭真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卓有成效，包含鄧、彭各自的個人運動表現和兩人之間的通力合作，令毛澤東甚感滿意。他因此更進一步地希望整風、「反右派」期間所形成的中央領導格局和指揮模式——以他為首的政治局常委會，直接經由鄧、彭領銜的中央書記處統領黨內百官、推動政策。可以擴及到政治領域之外。1958 年 2 月 17 日，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88）根據這個新的組織安排，中央書記處及其領導人鄧小平和彭真，就在同年發起的「大躍進」運動中擔綱演出。

拾、結論

正文對彭真在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和影響所作的細密研究，如何能增進我們對更大的中共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毛澤東時期經常發起的政治運動的認識？⁸ 此處將以彭真的個案為例，著重探討：在中共政治運動推行的過程中，「督導人」的任務、角色，以及其政治影響。所謂中共政治運動中的「督導人」，主要指的是負責將中央的運動指示，具體部署和落實在各部門和地域的領導幹部。這包括了代表中央督促下級單位運動進展的中央負責幹部，以及職司各單位內運動推展工作的機關首長（這裡特別指省部級以上）。

彭真跨足中央和地方、身兼多項要職，在整風、「反右派」期間就多方面地作為負責推進該運動發展的「督導人」。在中央一級，彭真即常以中央書記處領導人的身分聽取中央部會或地方省委的運動彙報並直接做出裁示。另外，彭真在中央另外分工管理統戰與政法工作，他更往往直接指揮與布置這兩個領域的運動。在地方一級，彭真又兼任北京市黨的最高負責人，具體掌握燕京的運動發展。正由於彭真在整風、「反右派」中作為一名具有高度代表性的運動「督導人」，綜合他的相關作為和活動，可以初步整理、歸納出中央

8 作者感謝審查人所提的建議：透過彭真這個案例研究「展示比較大的問題」，特別是藉之以增進對中共政治運動的了解。

和省級「督導人」的主要工作任務和內容，從而對中共政治運動中重要執行骨幹的基本行為模式，有一個比較整體的認識和了解。

一、「督導人」必須針對運動在不同階段所提出的任務，提出相應的具體措施，要求下級幹部和黨員按部就班地根據運動的規劃行事。就像在醞釀和發動整風階段，由於中共呼籲各級黨幹改正不良之風，彭真一方面領導中央統戰部召開座談會，廣邀黨外人士對中共的施政提意見，另一方面，他驅策北京市委高幹檢查工作，並成立整風領導小組負責統管此事。在「引蛇出洞」階段，彭改而要下級如中央統戰部和北京高校黨委暗中設計圈套，設法誘引「黨外上層活動份子」和大學高校師生表達看法；但為了防止對黨的不滿之氣溢向社會，他透過廣播演說穩定工人的情緒，也屢次指示中小學先按兵不動。在「反右」階段，他則要屬下毫不心軟地追抓「右派」，並且將運動擴向先前未深入的領域（如政法單位）和未觸動的部門（如中小學）。

二、「督導人」為了驅動下級黨幹忠實履行運動的階段性規劃，必須懂得並擅於製造、運用政治壓力。例如：彭真以作政治報告、參加座談會或是訪察的方式，讓下層僚屬及時明瞭運動的最新政策和指示。彭真後來又密集聆聽下級的運動彙報，追蹤後續的發展，教後者不敢怠忽職守。對於堅決服從運動指示者，彭真不吝勗勉，要之再接再厲；對於態度猶疑者，他則當面加壓，要求限期改進。彭真就曾批評中央黨校的楊獻珍和清華大學的蔣南翔畏首畏尾，強逼他們更積極地挖抓「右派」，如此使得這兩個單位的「反右」急遽升溫。此外，彭真在北京市採行的規定「右派」人數比例的方法，更是讓首都黨幹為了達到運動指標而不擇手段、寧枉勿縱。

三、「督導人」為了炒熱政治運動溫度，讓運動批判有的放矢，會結合其經管或負責的部門、單位的實際情況，選擇或批可特定的批判標靶，藉以營造對立的局勢，並且在其中進行分化、排隊、拉攏和敲打，以讓敵人陷於孤立、少數的地位，並將朋友和同情者擴大為多數（Chen, 1986: 11-12, 181-182）。譬如：監察部的主要批鬥目標是副部長王翰；在清大的首要批判目標，黨內是袁永熙，黨外則是錢偉長。這些要不是出自彭真的意見，就是經過他的同意。在選定政治對立面以後，「督導人」通常也會介入批判或在幕後進行操控。章伯鈞、羅隆基、黃紹竑等民主黨派人士，是彭真在「引蛇出洞」階

段中鈞引出來的。彭真是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人，他就利用人大開會之機，動員非共人士程潛、唐生智和在北京與自己熟識的吳晗、梁思成等人，對章、羅、黃等「大右派」進行砲轟，讓他們名譽掃地、身敗名裂。「督導人」在操作運動批判時，其目的不單是要批判標靶俯首、喪志，同時也希望藉由此一政治批判過程，對佔大多數的觀望人士進行政治教育、教化和爭取。

四、「督導人」成功鼓動黨員與群眾投入批判和揭發，將運動推向高潮後，也要適時對之予以調控，免得運動衝擊面過大、耗時過久，也耽擱了正常的工作。彭真對高校教授和中小學的「反右」運動，先是鼓勵放手、再逐漸收縮，就是明顯的例子。在運動的後期，「督導人」還負責對運動的批判對象進行最終的政治甄別、定性，以及組織處理。彭真偕鄧小平以中央書記處會議為平台，審核屬於中央管理幹部的「右派」名單。在中央廣播單位工作的局級幹部溫濟澤，其「右派」帽子就是由彭真定案。北京市委管理的幹部和人員是否被劃作「右派」，彭真更是一言定奪。從大學講師到學生，都有被他指定而被打入政治另冊者。此外，「督導人」也身負政治甄補的任務，亦即對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進行獎賞和培養。在人大會中的「反右」先鋒梁思成，就是獲得彭真的保薦而加入共產黨（《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369-370）。

綜上所言，中共中央發出運動的號召以後，如彭真般的中央和省級「督導人」的角色甚為重要。「督導人」的工作絕不僅是照本宣科地上令下達而已。事實上，「督導人」在承上啓下、執行運動的過程中，有不少複雜和細緻的工作需要處理，在其中也有一定的權衡空間和仲裁餘地。正因為有「督導人」這種「組織保證」，中共全國性的群眾運動，包括：本文探討的整風、「反右派」運動，之後相繼推出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大煉鋼鐵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在各部門和地域推行時，不但事態發展過程如出一轍，也多能達致一呼百諾、風行草偃的效果。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丁 抒

- 1995 《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Ding, Shu, 1995, *Open Conspiracy: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90's Magazine Company and Zhen Shan Ltd.)
- 2006 《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修訂本。香港：開放雜誌社。(Ding, Shu, 2006, *Open Conspiracy: The Complete 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nti-Rightist Campaign*,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Open Magazine Company.)

人民日報

- 1957a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我憤恨、我控訴！——吳晗的發言〉。人民日報，7月7日，第4版。(People's Daily, 1957a, "Speeches in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1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 Anger, I Accuse!—Speech by Wu Han," *People's Daily*, July 7, p. 4.)
- 1957b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堅決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程潛的發言〉。人民日報，7月9日，第3版。(People's Daily, 1957b, "Speeches in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1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solutely Defeating the Attack by Rightists!—Speech by Cheng Qian," *People's Daily*, July 9, p. 3.)
- 1957c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旭日的萬丈光芒照射出陰雲裏的魑魅魍魎——唐生智的發言〉。人民日報，7月12日，第9版。(People's Daily, 1957c, "Speeches in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1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Utmost Glory Reflects the Ghosts in Dark Clouds—Speech by Tang Sheng-zhi," *People's Daily*, July 12, p. 9.)
- 1957d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我為什麼這樣愛我們的黨？——梁思成的發言〉。人民日報，7月14日，第2版。(People's Daily, 1957d, "Speeches in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1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y I Love Our Party So Much?—Speech by Liang Si-cheng," *People's Daily*, July 14, p. 2.)
- 1957e 〈反右派鬥爭的一次偉大勝利——祝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閉幕〉。人民日報，7月16日，第1版。(People's Daily, 1957e, "A Great Victory of the Anti-Rightist Struggle—Congratulations to the Closing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1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eople's Daily*, July 16, p. 1.)
- 1957f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建築工作者擔負著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楊廷寶、林克明、朱兆雪、梁思成的聯合發言〉。人民日報，7月21日，第11版。(People's Daily, 1957f, "Speeches in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1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Honorable and Difficult Missions of Architects—Joint Speech by Yang Ting-bao, Lin Ke-ming, Zhu Zhao-xue and Liang Si-cheng," *People's Daily*, July 21, p. 11.)
- 1957g 〈在鬥爭的緊要關頭背叛共產主義立場，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人民日報，7月22日，第2版。(People's Daily, 1957g, "Betray Communism in the Crucial

- Moment of the Struggle, Yuan Yong-xi Attacks Our Party as an Internal Support for the Rightists,” *People’s Daily*, July 22, p. 2.)
- 1957h 〈徹底批判了溫情主義和右傾思想，監察部挖掘出黨內幾個右派分子，彭達、陳達之、梁建一、安汝濤的反黨言行被揭發〉。人民日報，8月20日，第1版。(People’s Daily, 1957h, “Thoroughly Criticizing the Undue Leniency and Right-leaning Thoughts, Ministry of Supervision Digs out Several Rightists, Anti-Party Speeches of Peng Da, Chen Da-zhi, Liang Jian-yi and An Ru-tao Are Exposed,” *People’s Daily*, August 20, p. 1.)
- 1957i 〈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活動——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許廣平在全國婦代會上的發言〉。人民日報，9月14日，第3版。(People’s Daily, 1957i, “Regarding the Activities by the Anti-Party Group Headed by Ding Ling and Cheng Qi-xia—Speech by the Vice-President of All-China Woman’s Federation Xu Guang-ping in the National Women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People’s Daily*, September 14, p. 3.)
- 1957j 〈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人民日報，10月9日，第1版。(People’s Daily, 1957j, “Still Severe Struggle in the Political-legal Front,” *People’s Daily*, October 9, p. 1.)
- 1957k 〈監察機關反右派鬥爭取得重大勝利，徹底鬥倒反黨分子王翰〉。人民日報，12月5日，第1版。(People’s Daily, 1957k, “A Great Victory by Ministry of Supervision in the Anti-Rightist Struggle, Thoroughly Destroying Anti-Party Element Wang Han,” *People’s Daily*, December 5, p. 1.)
- 1957l 〈政法部門需要徹底的整頓〉。人民日報，12月20日，第1版。(People’s Daily, 1957l, “Political-legal Departments Need to Conduct a Thorough Rectification,” *People’s Daily*, December 20, p. 1.)
- 1958 〈維護國家紀律、貫徹政策法令、保護國家財產、發揮監察工作作用、促進工農業大躍進：全國監察工作會議檢查了八年來的工作，確定了今年的任務〉。人民日報，4月8日，第4版。(People’s Daily, 1958, “Maintain the National Discipline, Implement Policy and Regulation, Protect National Property, Develop the Function of Supervision Works, and Promot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Supervision Works Conference Examines the Works of Latest 8 Years and Decides Tasks This Year,” *People’s Daily*, April 8, p. 4.)

于光遠

- 1997 〈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5: 29-35。(Yu, Guang-yuan, 1997, “Memories about Peng Zhen,” *Hundred Year Tide* 5: 29-35.)

中共北京市委

- 2003 〈中共北京市委對市委教育部關於小學整風工作部署請示的批示（1957年12月17日）〉，見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年）》，頁899-903。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2003, “CCP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s Instruction to Its Education Department Related to the Deployment of Rectification Work in Elementary School, December 17, 1957,” pp. 899-903 in *Beijingshi Dangangan an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eds.), *Important Selected Documents of Beijing City in 1957*.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

- 2000 《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Liu Ren Zhuan Bianx-

iezu, 2000, *Biography of Liu Ren*.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 2011 《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第 2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2011,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Beijing*, Vol. 2.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毛澤東

- 1992 〈中央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頁 537-538。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Mao, Ze-dong, 1992, “Party Center’s Notification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Denouncing More Primary Rightists by Name,” pp. 537-538 in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Mao Zedong’s Manuscrip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Vol. 6.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1999a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 7 卷，頁 204-244。北京：人民出版社。(Mao, Ze-dong, 1999a, “Regarding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pp. 204-244 in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Ze-dong*, Vol. 7.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1999b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 7 卷，頁 267-283。北京：人民出版社。(Mao, Ze-dong, 1999b, “Speech in the CCP’s National Propaganda Works Conference,” pp. 267-283 in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Ze-dong*, Vol. 7.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王 迅

- 2012 〈我們這一屆——幸運地躲過了階級鬥爭大漩渦的一九五二級學生〉。復旦大學校友網，6 月 13 日。2013 年 2 月 18 日，取自 <http://www.fudan.org.cn/archives/13198> (Wang, Xun, 2012, “We, the Students of Year 1952, Luckily Escaped the Class Struggle,” Fudan University Alumni, June 13. Retrieved February 18, 2013, from <http://www.fudan.org.cn/archives/13198>)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整理）

- 2012 〈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10: 68-73。(Wang, Hanbin (recounted), Qin-ying Han (recorded), 2012, “Memories about Working with Peng Zhen for 25 Years,” *Research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10: 68-73.)

王 澈

- 1957 〈傅鷹教授一席談〉。人民日報，5 月 25 日，第 2 版。(Wang, Che, 1957, “A Talk with Professor Fu Ying,” *People’s Daily*, May 25, p. 2.)

王學珍

- 2007 〈懷念陸平同志〉，見《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編），《陸平紀念文集》，頁 13-1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Wang, Xue-zhen, 2007, “In Memory of Comrade Lu Ping,” pp. 13-17 in Lu Ping Jinian Wenji Bianweihui (ed.), *Commemorative Collection of Lu Ping*.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教處

- 2002 〈法院老同志的懷念〉，見劉光人（主編），《永遠難忘劉仁同志》，頁 126-128。北

- 京：群眾出版社。(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Beijing Municipal High People's Court, 2002, "Remembrance from Court's Old Comrades," pp. 126-128 in Guang-ren Liu (ed.), *Unforgettable Comrade Liu Ren*. Beijing: Qunzhong Chubanshe.)
- 平乃彬
2011 〈南口北京高校勞改營紀實〉，《炎黃春秋》6: 61-66。(Ping, Nai-bin, 2011, "The Record of Labor Camp for Beijing'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ankou," *Yan-Huang Historical Review* 6: 61-66.)
- 皮學軍
2012 〈光明日報社的「反右」運動〉，《炎黃春秋》6: 47-53。(Pi, Xue-jun, 2012,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Guang Ming Daily," *Yan-Huang Historical Review* 6: 47-53.)
- 朱 正
2001 《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Zhu, Zheng, 2001, *Two Schools Contending: Anti-Rightist Struggle*. Taipei: Yun Chen Culture Ltd.)
2011 〈我對反右起因的解釋〉，《炎黃春秋》6: 87-89。(Zhu, Zheng, 2011, "My Explanation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Yan-Huang Historical Review* 6: 87-89.)
- 江渭清
1996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Jiang, Wei-qing, 1996, *70 Years' Journey: Jiang Wei-qing's Memoir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何 方
2005 《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香港：利文出版社。(He, Fang, 2005, *Notes on Party History: From Zunyi Conference to Yan'an Rectification*, Vol. 1. Hong Kong: Li Wen Chubanshe.)
- 李向東、王增如
2006 《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Li, Xiang-dong and Zeng-ru Wang, 2006, *The Whole Story of the Case of Injustice of Ding-Chen Anti-Party Group*. Wuhan: Hubei Renmin Chubanshe.)
- 李向前、王桂華
2002 〈電視文獻片：彭真〉，《百年潮》11: 75-80。(Li, Xiang-qin and Gui-hua Wang, 2002, "TV Document Video: Peng Zhen," *Hundred Year Tide* 11: 75-80.)
- 李海文、王燕玲（編）
2002 《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Li, Hai-wen and Yan-ling Wang (eds.), 2002, *A Dialogue in a Century: In Remembrance of New China's Law Founder Peng Zhen*. Beijing: Qunzhong Chubanshe.)
- 李慎之
1998 〈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見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113-138。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Li, Shen-zhi, 1998, "When Did Mao Decide to Adopt the Strategy of Luring out the Snakes?" pp. 113-138 in Han Niu and Jiu-ping Deng (eds.), *Snow in June: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Memory*. Beijing: Jingji Ribao Chubanshe.)
- 李維漢
1986 《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Li, Wei-han, 1986, *Reminiscence and Study*, Vol. 2.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Ziliao Chubanshe.)

- 李 輝
1993 〈與溫濟澤談周揚〉。語文資源網，2013 年 5 月 1 日，取自 <http://www.eywedu.com/wenxueyuedu/ssffszy/015.htm> (Li, Hui, 1993, "Talk about Zhou Yang with Wen Ji-ze," Yuwen Ziyuan, Retrieved May 1, 2013, from <http://www.eywedu.com/wenxueyuedu/ssffszy/015.htm>)
- 杜 光
2005 〈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炎黃春秋》9: 1-8。(Du, Guang, 2005, "The Inside Stories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Central Party School," *Yan-Huang Historical Review* 9: 1-8.)
- 沈志華
2008 《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Shen, Zhi-hua, 2008, *Reflections and Choices: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1956-1957)*.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邢小群
2008 《沒有告別的歷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Xing, Xiao-qun, 2008, *The History without Saying Good-bye*. Taipei: Xiu Wei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Ltd.)
- 阮 銘
2010 《尋找自由（第一部）：自由的追求與毀滅 1937-1966（上）》。臺北：玉山社。(Ruan, Ming, 2010, *To Search Freedom: Volume 1: Pursuing Freedom and Its Complete Destruction*. Taipei: Yu Shan Company.)
- 周恩來
1957 〈周恩來同志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負責人座談會的談話紀錄〉，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 216，目錄號 1，案卷號 116。(Zhou, En-lai, 1957, "Comrade Zhou En-lai's Speech in the Conference of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Leading Non-party Figures," Document No. 216/1/116, Archiv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 孟 紅
2007 〈彭真與老舍的人民情結和友誼〉，《北京黨史》2: 47-50。(Meng, Hong, 2007, "People's Connection and Friendship between Peng Zhen and Lao She," *History of CPC of Beijing* 2: 47-50.)
- 林 木
2012 〈反右運動五十五年祭，反右索賠帖〉。阿波羅評論網，3 月 5 日。2013 年 4 月 6 日，取自 <http://tw.aboluowang.com/comment/2012/0305/238126.html> (Lin, Mu, 2012, "Memorial Ceremony for Anti-Rightist Campaign 55 Years, Claim Letter for the Anti-Rightist," Aboluowang, March 5. Retrieved April 6, 2013, from <http://tw.aboluowang.com/comment/2012/0305/238126.html>)
- 俞梅蓀
2011 〈北京大學校友聯誼會成反右維權請願會——北京大學反右倖存者校友維權紀實〉。北京之春網，3 月 7 日。2013 年 2 月 17 日，取自 <http://beijingspring.com/pic/20110307.htm> (Yu, Mei-sun, 2011, "Alumni Association of Beijing University Becomes a Place for Petition to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Record of Right Protection of Survivors of Anti-Rightist Campaign at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spring*, March 7. Retrieved Feb-

- ruary 17, 2013, from <http://beijingspring.com/pic/20110307.htm>)
- 紀 彭
2012 〈程潛：在新中國過得明明白白〉，《領導文萃》13: 53-58。(Ji, Peng, 2012, "Cheng Qian: Live Clearly in New China," *Literature Collection of Leadership* 13: 53-58.)
- 韋君宜
2000 《思痛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Wei, Jun-yi, 2000, *Reflections on Suffering*.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
1967 《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無出版項。(Yuan Beijing Shiwei Jiguan Mao Zedong Sixiang Hongqi Bingtuan, 1967, *Big Careerist and Conspirator: The Most Odious History of Peng Zhen (1925-1966)*. Beijing.)
- 高 華
2000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Gao, Hua, 2000, *How Did the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高 瑜
2012 〈方勵之永遠是八九一代的良師〉。中國茉莉花革命網，4月9日。2013年4月7日，取自 http://www.molihua.org/2012/04/blog-post_6126.html (Gao, Yu, 2012, "Fang Li-zhi Is the Mentor for 1989 Generation Forever," Molihua, April 9. Retrieved April 7, 2013, from http://www.molihua.org/2012/04/blog-post_6126.html)
- 張道一
2009 〈憶吾師吳晗〉，見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頁683-68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Zhang, Dao-yi, 2009, "Remember My Teacher Wu Han," pp. 683-688 in Hong-zhi Wang and Li-shu Wen (eds.), *In Memory of Wu Han: Commemoration for His Hundredth Birthday*.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章詒和
2005 《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Zhang, Yi-he, 2005, *Wind Leaves an Everlasting Perfect S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郭道暉
2009 〈從我的經歷看反右〉，《炎黃春秋》5: 52-59。(Guo, Dao-hui, 2009, "To Know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from My Experience," *Yan-Huang Historical Review* 5: 52-59.)
- 陳永發
2001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社。(Chen, Yong-fa, 2001,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陸 瑩
2007 〈懷念陸平同志〉，見《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編），《陸平紀念文集》，頁116-12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Lu, Ying, 2007, "In Memory of Comrade Lu Ping," pp. 116-125 in Lu Ping Jinian Wenji Bianweihui (ed.), *Commemorative Collection of Lu Ping*.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彭 真

- 1958 〈彭真同志在省市委工業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 219，目錄號 1，案卷號 27。(Peng, Zhen, 1958, “Comrade Peng Zhen’s Speech in the Conference of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Industrial Secretaries,” Document No. 219/1/27, Archiv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 2003a 〈在工業、財貿、建築系統黨員幹部會上的講話（1957 年 6 月 3 日）〉，見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 年）》，頁 306-320。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Peng, Zhen, 2003a, “Speech in the Party Cadre’s Conference of Industry, Finance and Trade, and Architecture Sectors, June 3, 1957,” pp. 306-320 in *Beijingshi Dangangan an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eds.), *Important Selected Documents of Beijing City in 1957*.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 2003b 〈在全市黨政領導幹部會上的報告（1957 年 11 月 28 日）〉，見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7 年）》，頁 855-882。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Peng, Zhen, 2003b, “Speech in Conference of Beijing Municipal Leading Cadres, November 28, 1957,” pp. 855-882 in *Beijingshi Dangangan an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eds.), *Important Selected Documents of Beijing City in 1957*.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彭真傳》編寫組（編）

- 2012a 《彭真傳》，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o (ed.), 2012a, *Biography of Peng Zhen*, Vol. 3.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2012b 《彭真年譜》，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o (ed.), 2012b, *Chronicle of Peng Zhen*, Vol. 3.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湯壽根

- 2012 〈建築大師的悲喜人生〉，《民主與科學》5: 70-73。(Tang, Shou-gen, 2012, “Sadness and Joy of an Architecture Master’s Life,” *Democracy and Science* 5: 70-73.)

華夏經緯網

- 2012 〈北京人藝六十周年五人談：開放傳統中走向未來〉。華夏經緯網，12 月 20 日。2013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big5.huaxia.com/zt/zhwh/12-054/3136954.html> (Huaxia, 2012, “60th Anniversary of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 5 People’s Talk: Open Tradition and Go Forward to the Future,” Huaxia, December 20. Retrieved April 10, 2013, from <http://big5.huaxia.com/zt/zhwh/12-054/3136954.html>)

黃子琴

- 2012 《大右派林希翎——她的政治命運和情感世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Huang, Zi-qin, 2012, *Big Rightist Lin Xi-ling: Her Political Fate and Romance*.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黃河清

- 2004 〈巾幗更勝丈夫——我同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先生的一段緣〉。新語絲網，3 月 17 日。2013 年 3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lijiansheng.txt> (Huang, He-qing, 2004, “Woman Excels Ma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e and Zheng Bo-jun’s Wife Li Jian-sheng,” Xinyusi, March 17. Retrieved March 15, 2013, from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lijiansheng.txt>)

董克讓

- 2009 〈又是一座恐怖的人間地獄——《命運的祭壇》（魏光鄴編著）讀後〉。博訊新聞網，9月5日。2013年2月20日，取自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9/09/200909052112.shtml (Dong, Ke-rang, 2009, "Another Hell in Man's World—Reflection after Reading *Altar of Fate* Edited by Wei Guang-ye," Boxun, September 5. Retrieved February 20, 2013, from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9/09/200909052112.shtml)

趙家梁、張曉霽

- 2008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Zhao, Jia-liang and Xiao-ji Zhang, 2008, *The Past Beneath a Broken Tombstone: Gao Gang in Beijing*. Hong Kong: Dafeng Chubanshe.)

劉 涌

- 2002 〈彭真與北京的政法工作〉，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彭真在北京》，頁256-26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Liu, Yong, 2002, "Peng Zhen and the Political-legal Works of Beijing," pp. 256-263 in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ed.), *Peng Zhen in Beijing*.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鄭笑楓

- 2007 〈一條內參帶來的厄運——兼記1957年《光明日報》反右鬥爭前前後後〉。光明日報網上報史館，4月1日。2013年4月1日，取自 http://www.gmw.cn/content/2007-11/29/content_935589.htm (Zheng, Xiao-feng, 2007, "Misfortune Caused by a Report of Internal Reference—Anti-Rightist Struggle in 1957 *Guang Ming Daily*," *Guang Ming Daily History Online*, April 1. Retrieved April 1, 2013, from http://www.gmw.cn/content/2007-11/29/content_935589.htm)

鄭紹文

- 1957 〈王翰是個右派分子並不奇怪〉。人民日報，12月8日，第4版。(Zheng, Shao-wen, 1957, "It's Not Strange That Wang Han Is a Rightist," *People's Daily*, December 8, p. 4.)

鄧小平

- 1994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Deng, Xiao-ping, 1994,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2.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錢理群

- 2007 《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Qian, Li-qun, 2007, *Refusal to Forget: Notes for "1957 Stud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戴 煌

- 1998 〈我聽話成了「右派」〉，見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317-323。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Dai, Huang, 1998, "Being Tame Then I Was Labelled a Rightist," pp. 317-323 in Han Niu and Jiu-ping Deng (eds.), *Road of Thistles and Thorns: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Memory*. Beijing: Jingji Ribao Chubanshe.)

鍾延麟

- 2010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2(4): 521-562。(Chung, Yen-lin, 2010, "Deng Xiaoping'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Gao Gang-Rao Shushi Inciden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2(4): 521-562.)
- 2013 《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Chung, Yen-lin, 2013, *Deng Xiaopi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s "Vice Marshal" (1956-1966)*.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魏紫丹

2007 〈建立《1957年學》方法談〉，《北京之春》10: 78-83。(Wei, Zi-dan, 2007, "Talk for Methodology of 1957 Studies," *Beijing Spring* 10: 78-83.)

顧行、成美

1991 《鄧拓傳》。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Gu, Xing and Mei Cheng, 1991, *Biography of Deng Tuo*. Taiyuan: Shanxi Jiaoyu Chubanshe.)

B. 外文部分

Chen, Yung-fa

1986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otter, Pitman B.

2003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 R. 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eiwes, Frederick C.

1993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nd Edi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Peng 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Rectification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of 1957

Yen-lin 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spring of 1957,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itially, this campaign aimed at rectifying certain shortcoming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owever, it soon became a political purge in which outspoken individuals were hunted out and labeled Rightists. During this notorious campaign, Peng Zhe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figures. A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CP and the second-ranking leader of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Peng Zhe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decision-making and zealously assisted Deng Xiaoping in carrying out the campaign policies such as “luring out the snakes.” As the Central leader who took charge of political-legal affairs and united front works, Peng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adical campaign development in these two fields. Furthermore, Peng concurrently served as the Party Secretary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He was in charge of direc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campaign of Beijing city, and was eager to promote the campaign experiences of the nation’s capital as an example for emulation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o sum up, Peng contributed much to escalating and radicalizing the campaign, and driving it forward excessively. Regarding the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campaign, Peng was Mao’s trusted follower to implement his political initiatives, and he cooperated well with Deng to accomplish the campaign. This study also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led by the CCP, and particularly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campaign executor.

Key Words: Peng Zhe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nti-Rightist Struggle, Mao Zedo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